

编后记

本期含“名家特稿”“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：消费经济动能”“学术争鸣”“鲁迅研究”“文艺美学研究”“宋明理学研究”等专题，刊文凡19篇。

王夫之的学术具有非常典型的跨学科特点，他的《船山全书》真似一座宝矿，可以任不同目的之人挖掘各自需要的东西，大都能满载而归。他的诗赋称誉一时，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等是史学界重点研读的经典；他的《夕堂永日绪论》是文学界无法忽略的存在，论情景关系，深中肯綮，既收束前论，也牢笼后说；他的《老子衍》《庄子通》《张子正蒙注》以及有关《周易》《礼记》等著述，皆多发人之未发。他出入文史哲三界而自加融通、自成一家并自立峰峦，也因此通王夫之一义不易，通诸义更难。他有关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的论述都似学术史上的异峰突起，带有一定的总结意义。王夫之的故乡湖南衡阳有两座山：一座名南岳衡山，一座名石船山。论海拔衡山超过1300米，石船山不到300米，但因为王船山的存在，谁又能说石船山的海拔低呢？王船山的大气磅礴也令石船山气象峥嵘，这就是人文的力量。清代学者刘献廷《广阳杂记》称：“（王夫之）其学无所不窥，于《六经》皆有发明。洞庭之南，天地元气，圣贤学脉，仅此一线耳。”实事求是说，把王夫之的影响限定在“洞庭之南”，还是过于保守了。本期推出杨国荣《王夫之与中国哲学》一文，也足见王夫之哲学的包容之广与创造之力。他一如此前哲学家一样谈性说理，折中名实关系；辨气析物，盘桓天人之间。但他把“人”的因素始终放在哲学之“中枢”，以此让他的哲学思想既带着形上的玄奥，也带着淋漓的生气。他从反清复明的兵荒马乱中，退居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，从奔突不息之动到透彻澄明之静，从而完成了自己人生和学术终极之修炼。杨国荣此文虽是以讲稿为基础，实是多年精研之结果，扑面而来、沁人心脾、启人神智的哲思，读来自有一种如春天一般的畅快。

没有人怀疑中国人的乐感精神，也因此没有人怀疑音乐在中国人建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意义。“诗乐舞”三位一体是一个古老的话题，因为古老也证明了传统的悠久和底蕴的深厚。每个人的心跳就是一种收放的节奏，每个人的想象则是一种流动的旋律。失去了节奏与旋律的文学，也就庶几失去了文学的魂魄。我就不去追寻文学的音乐源流了，诗词歌赋自然不用说，即古文也在诵读中传出一种特别的韵味。所以，对中国文学，无论哪种文体，无论什么时代，放声去“读”一定是对的，只是如何带着情感去读，读出怎样的韵味的问题。王小盾的学术研究似乎一直在一种“关系”中进行，他的学术特点不是线性的，也不是单立面，而是在众多看似纷乱的线性和单立面学术交错中突围，引出自己的结论，也因此他的结论总是“味在酸咸之外”。本期推出他关于文论与乐论在形式上始合终分、虽分犹合的关系论析，这个结论并不新鲜，但王小盾用历史语言学、考古学等方法，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，这就彰显了相关结论的逻辑性和纵深感。当然，更多的问题尚有待一一条理和深化。

从中国人民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，新中国走过了75年的辉煌岁月。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，本期特开设“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：消费经济动能”专题，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突出面向——全面促进消费，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——为聚焦点，关注消费经济动能课题。这是一个兼有政治、经济及时代发展等多方面的社会性问题。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，对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三篇专题文章从消费的基础性作用、供需匹配与潜在居民消费路径、流动人口与城镇人口消费关系等方面着手，试图有体系地探究和解决其间的若干问题。

“气化谐和”是一种历经种种离合、变异与融通之后的浑厚静穆之气象，是一种审美哲思之境。没有经过裂变的一团和气，其实也就没有质感，一种学术的昌明大概也是如此，这是本刊常设“学术争鸣”的原因所在。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化轨迹总体是比较清晰的，词中有诗、曲中有词乃是一种常态，以诗为词、以词为曲也就成为后来文体的一种常用创作手法。但这种文体嬗变中的体性与精神传承总体还是隐性的，而明清小说中的诗词曲，则是以独立文体呈现出来的，是显性的存在。如何看待这种文体与文体之间的“兼容并包”现象，涉及如何裁断文体之间的关系问题。赵义山年来既辑有《全明小说寄生词曲辑纂》，又有《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》一书，对此文体现象的

关注由来已久，“寄生”一词也借相关论著而传播甚广。本刊2023年第1期曾刊出饶龙隼一文，对“寄生”说表达了不同意见，为使“商榷”在一种更透明的情况下进行，本刊在2021年12月下旬收稿不久即将饶龙隼之文转赵义山，征求其看法，并嘱若有不同意见，可另撰一文与饶文同时刊出。倏忽一年过去，未见赵义山来稿，只能先将饶文刊出；又一年收到赵义山来文，因再刊出。学界对此话题有兴趣者，可对勘二文而各依心志自行取舍，刊物只是在确定话题基本意义的前提下提供商榷的平台，让各路英雄自由对话而已。而裁断的权力永远在读者的心中手中，并以此原汁原味留存在源远流长的学术史上。

为去世的皇帝谥号，朝廷官员其实很烧大脑。尽量避免重复是一方面，如何精准地结合皇帝生前功过予以准确的评价是更重要的一方面。南宋赵昀谥号孝宗，所谓“孝”，肯定包括孝事高宗这一层意思。何以高宗要特别被“孝”呢？这与赵构为何庙号“高宗”有关。靖康之难后，宋徽宗、宋钦宗被虏东北，其实便宣告了北宋之灭亡。而赵构在危难之际，在南京应天府另立南宋，以接续北宋之皇家大业。换言之，若两宋合一，中间未生变故，赵构便不当也不可能被称“高宗”。所以高宗这一庙号意味着重建宋朝再谋中兴的意思。知道了“高宗”的来历，才能明白孝事高宗，如果只是停留在我们观念中具体而微的尽孝诸事，便未免简单化了朝廷诸大员的用心。赵昀如果不能承继高宗的北伐恢复之志，便是最大的不孝。事实上赵昀一直致力于完成高宗未竟的恢复大业，堪称“大孝”。虽然在如何恢复上，赵昀与当朝士大夫的意见并不尽一致，但不妨碍他的“孝宗”谥号。这个问题和结论看似简单，但要论证到实处，也是相当费力。胡斌《事亲与继志：宋孝宗之“孝”新论》一文，主要探讨的便是在恢复的时机与应变上，孝宗的种种思路和作为。

在层峦叠嶂的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中，宋明理学属于比较典型的“危峰兀立”。何以如此评价呢？原因是中国哲学经过绵延的发展、碰撞、分化与衍生，在北宋到了在反思中总结，在总结中新生的阶段。北宋哲学面对的不再是一棵树，即使这棵树足够高大茂盛，放在哲学的森林中，依然可能被淹没无影，从哲学的森林中突围蜕变才是北宋哲学的出路所在。儒禅代兴带来的不是谁取代谁，而是如何在既保持相对对立，又彼此融合的情况下，形成哲学思想的第三种状态。没有什么比掌控思想更艰难，但在哲学的世界里，也没有什么比掌控思想更快乐，这是北宋哲学家彼此纷争不断却又乐此不疲的原因所在。理学的起点是充分肯定世界，如此“工夫”就是很现实的问题。不能被程颢“存久自明”与苏轼“无心而信”文字表面的意思迷惑了，其实在这八个字的背后有太多需要身体与意识协调的过程，必须磨炼的从信任到直觉的贯通。郑泽绵讨论苏轼、“二程”与宋代心性工夫论的关系，要解决的就是从哲思的回流中如何通向“明”与“信”的境界。

近十多年以来，王阳明很火也很忙，恐怕也很累，他的心学在一种无形的潮流推动下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显学。有人说劝君莫谈陈寅恪，其实谈王阳明同样需要格外慎重。大哲的深玄之思需要读者的“工夫”与睿智才能体会一二，否则，也就只能说点模糊影响之论了。有的时候，一学之昌盛往往意味着一学之衰落，群相驱动的结果，偶尔的精义反而散荡无影，触目所见的则是被涂抹被遮蔽甚至被扭曲过甚的空壳，显学的危险也正在这里。或者在显学汹汹之时，依然有几个心智不凡的素心人，在三家村里青灯之下捧读含玩，辩论无碍，可能是一种更加尊重经典的姿态。阳明学的开场锣鼓就包含了对朱熹“格物致知”说的辨析，当然，这种辨析是否完全契合朱熹的本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王阳明大体把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说理解为一种认识论的工夫，揭示了部分的意义，却也遗失了部分的意义。这是因为朱熹格物本身就包含着不同的阶段性。“致知”的重点也不在外在物理，而是内在心理，是人心先天具有的本体之性展现为作用之情的灵机妙能，如此认识论的局限也就显而易见了。日本学者藤井伦明从心性论的角度诠释“格物致知”，试图打通朱熹与阳明之“知”。

春天来了，灯下读着即刊的文章，突然想起这春天的大地就是一篇绝美的文章，这篇绝世的美文又是谁来书写的呢？甲辰元月曾与数友人踏访汎洲岛，岭南春色早，不经意间已是满山青葱，更兼岛上海天一色，令人沉醉其间，叹赏不置。众议春色岂能辜负，当以词写之。余闻命拈笔而先成，录于下：

醉花阴

南岭绵延山不老，青翠拥孤岛。浪白海豚轻，曼妙身姿，为报春华早。
我今且问春词稿，竟是谁来草。莫管满庭芳，帘外芭蕉，只认东风道。